

张栻及其哲学

一代學者宗師

蔡方鹿 著

巴蜀書社

一代学者宗师

蔡方鹿 著

巴蜀书社

一九九〇年 成都

封面题字：辛冠洁

责任编辑：黄小石

封面设计：张光明

一代学者宗师

蔡方鹿 著

巴蜀书社 出版发行

(成都盐道街三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960 毫米1/32 印张6.875 插页2 字数150千

1991年8月第一版

1991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2,690册

ISBN7—80523—373—X/B·40

定价：2.43元

DG05/10
序

朱熹、吕祖谦、张栻，号称“东南三贤”，三人切磋学术，过往甚密。我在写完《朱熹思想研究》以后，本想继续研究吕、张两人思想，然冗事缠身，学力不逮，以为一憾！恰我中学同窗、师兄潘富恩教授著有《吕祖谦思想初探》，承蒙潘教授旧谊殷切，命我作序。盛意难却，勉力为之。今有原我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师进修班（硕士课程）学员蔡方鹿同志，风华正茂，刻苦好学，积多年之工，完成《张栻及其哲学》一书。我曾担任该班的班主任，蔡方鹿同志要我作序，一时犹豫，总觉自己学识浅，贻误他人。但他不忘旧情，我也为“东南三贤”都有研究专著出版而高兴，于是欣然接受这

一任务，亦可借此暂了我多年之宿愿。

张栻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思想的遗产。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有着密切的联系，从中国文化的形成和演变来看，它经历了三层结构。汉文化是中原华夏多种文化与四夷（包括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百越等）文化的交融，亦可以说是先秦以来东、西、南、北、中百家文化的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风格、神韵、心理结构、伦理道德的中华民族本土文化。汉文化为中华民族文化奠定了基础，并显示了它的灿烂和光辉。汉以后，中华民族本土文化第一次迎来了外来印度佛教文化的挑战。隋唐时，随着寺院经济的繁荣，佛教文化进一步发展并中国化，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且有压倒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道教文化之势。然而，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和生命力，她在外来佛教文化挑战面前，虽也有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但也有主张“统合儒释”的。然而，儒、释、道三教融合是大势，中国传统儒学在吸收、融合佛、道文化的同时，亦改变了自己的形式，产生了理学。理学使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东方文化的代表之一，从而影响东南亚和世界。从秦汉至宋，一千余年间，中外文化的融合发展，创造了世界上最辉煌的中世纪文化。如果说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高峰是古希腊、

罗马的话，那么，中国文化作为人类文明的第二个高峰，是当之无愧的。

理学并不是单一的，乃是由各家各派汇合而成的，濂、洛、关、闽、陆学，还应该加上湖湘学派等，形成了理学思潮。在这个思潮中，张栻是一个创学派的人物。张栻幼受庭教，其父张浚曾受学程颐的弟子谯定；及长，师事开湖湘学派之端绪的胡宏。他们先后在衡山和岳麓，开办书院，讲学授徒。由于张栻的努力发扬，使湖湘学派成为理学中气势最盛的一派，在理论的建构上，他在与朱熹的切磋琢磨中，互相“讲究”，相互启发，“去短集长”互采互补，完善了各自的哲学思想体系。因而他能青出于兰而胜于兰，“比五峰（胡宏）更纯粹”，规模更宏大，深化和发展了湖湘学派。在事功上，张栻注重经世之学，笃志躬行践履。他秉承父志，反对议和，坚持抗金。他培养的学生，不少人在治国、抗金、抗元斗争中作出了贡献。当元兵攻击长沙时，“岳麓诸生荷戈登陴，死者十九”，与空谈心性者，实有异趣。蔡方鹿同志在书中以翔实的资料，透彻的眼光，分别梳理了张栻的理论的建构和事功的修为，和盘托出了张栻的本来面目，实在难得。

湖湘学派由于居理学的重要地位，所以在当时

和后世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主要是张栻在学术上的成就和对理学的贡献，而不是靠其父亲的业绩或自己的权势。“致广大、尽精微，综罗百代”的理学集大成者朱熹自称，闻道比张栻晚，“赖老兄提掖之赐，今幸略窥”，这恐非溢美之辞，是乃真实感情的流露。黄宗羲在《南轩学案》中曾指出，当时与朱熹相互切磋学术的主要有吕祖谦、陆九渊、张栻等人，而所佩服者，唯南轩一人。其所以使朱熹叹服，主要有二：一是“见识卓然不可及”，“反复开益为多”；二是“学问愈高”，“议论出人表，近读其语，不觉胸中洒然”（《宋元学案》卷五十）。张栻之学，亦得朱熹“相与博约又大进焉”。张朱之学，实乃相得益彰。加上张栻思想具有集众家之长的特点，在理学思潮的逻辑联系中，张栻之学便成为重要的一环。只有深入揭示张栻思想的纵横联结、性质特点，才能疏理理学各派的精微异同、学派特征、神韵风貌。因此，深入地、系统地的分析张栻思想，在宋明理学乃至整个中国哲学史、思想史的研究中，是应该引起充分重视的。遗憾的是近三十多年来却未被学术界所关注，这并非他的思想地位不重要，而是由于种种尽人皆知的客观原因和主观成见，耽搁了、贻误了、中断了对张栻思想的系统研究，蔡方鹿同志的新著《张栻及其哲学》

的出版，便可填补这个空白，这是学术界的喜事。

蔡方鹿同志在张栻哲学的研究中，并不固守旧观点、旧方法。而是采取了“哲学逻辑结构”的方法。所谓“哲学逻辑结构”，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包括所有制、分配、管理结构、管理机构的设置和调节杠杆的结构等）、政治结构（国家政权、阶级、政党、集团的结构等）背景下，诸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哲学范畴之间，构成了相对稳定的逻辑顺序、结合方式或构筑的体系。它包含这样三层涵义：第一，中国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把实践作为自己形成的基础的哲学范畴，是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的实践经验的概括，是一定历史时期的事物在人们认识中的再现。中国哲学范畴的逻辑发展，既把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进程作为自己形成和积累的进程，又把自然和社会的历史发展进程作为自己产生和形成的依据，它是上述两个历史发展进程在思维中的反映。

第二，中国哲学诸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要思维就必须有范畴，作为理论思维的哲学，是通过一系列范畴和由范畴组成的命题来表现的。一个民族的理论思维，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潮或一个哲学家的哲学体系，是由诸范畴构成的。并从整体的逻辑结构上，探索、确定诸范畴在一个时代思潮或哲学体

系中的地位和作用。

·第三，中国哲学逻辑结构是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影响下的结合方式或构筑的体系。因为哲学范畴及其联结的方式总是根植于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的。

在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活动中，方法问题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学科，其思维方法和研究方法，往往具有不同的特点，并对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具有不同的作用。一切理论的探索，归根到底都是方法的探索，特定学科的研究方法之完善程度在一定意义上表明着该学科的成熟程度，并带来该学科的发展。我们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照搬西方哲学史的传统研究方法，曾习惯地依据西方的哲学思潮、哲学家的自然观、认识论、方法论（辩证法或是形而上学）、历史观等几大块分门别类地加以评述，忽视了哲学体系的内在逻辑联系和整体结构。虽然这种方法在相当广泛的、各依对象的性质而大小不同的领域中是正当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它与中国哲学强调有机的整体性或整体的和谐性的思维特点不相适应。由于这种方法本身的局限，势必限制了中国哲学史研究的深入。因此，转变这种抽象分析方法，是十分必要的。蔡方鹿同志在《张栻及其哲学》一书中，运用“哲学逻辑结

构”这种方法，对张栻哲学作了系统的分析，突破了传统的框框，不仅新观点迭出，而且面目一新，具有浓厚的中国气味。目前，有不少同志用这种方法去研究中国美学思想、中国文学思想、中国史学思想、中国法学思想、中国经济思想、中国政治思想的逻辑结构，都突破了传统的研究方法，而别开生面，促进了该学科研究的深入，不能不说这是一个很好的尝试。

学术研究，不免会产生流派、体系。中国哲学史学的流派、体系和世界观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不同的世界观固然会产生不同的中国哲学史学的流派、体系；但同一世界观也会产生不同的中国哲学史学的流派、体系，这是客观存在的，比如同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古代的孔子、老子、孟子、庄子以至张载、二程、朱熹、王夫之等等哲学体系的性质、价值评价，便截然不同。又譬如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对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各说齐陈，莫衷一是，这是很自然的现象。各学派之间应该开展真正的、积极的学术争鸣（包括批评），通过不同学派观点、方法的比较、竞争、鉴别，促进学术的发展。不要把不同学派学术观点的争论，掺杂进个人的意气或偷换成宗派之争。我们中年一代学人，差不多都经历“文化革命”的磨

难，没有理由不团结起来，为振兴中华民族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而贡献力量！

蔡方鹿同志多年来排除外来干扰，潜心于学术研究，今又完成《一代学者 宗师》（张栻及其哲学）一书，条分缕析，取材精当，新见涌出，文字流畅，我看后感到由衷地高兴。

以上是我看完蔡方鹿同志书稿后的一些感想，顺手写来，不觉已三千余字，只好打住，以免有劳读者精神。是为序。

张立文

一九八七年十月

二十日序于中国

人民大学哲学系

目 录

序.....	张立文 (1)
第一章 时代及背景.....	(1)
一、张栻生活的时代.....	(1)
二、理学产生的背景.....	(7)
第二章 张栻的生平及著作.....	(16)
一、张栻的生平.....	(16)
二、张栻的著作.....	(30)
第三章 张栻的社会政治思想.....	(32)
一、以理义治国，严于君子、野人之 分.....	(32)
二、政事以格君心之非为先.....	(35)
三、德治与养民.....	(37)

四、德礼为本，刑政为末·····	(38)
五、修攘之计·····	(43)
第四章 张栻的哲学思想 ·····	(47)
一、张栻哲学的主要范畴·····	(48)
二、张栻哲学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 ·····	(74)
三、张栻哲学的逻辑结构·····	(93)
四、理欲之分与义利之辨 ·····	(100)
五、知行说与居敬穷理说 ·····	(110)
六、辩证法思想 ·····	(122)
七、小结 ·····	(129)
第五章 张栻与朱熹 ·····	(134)
一、中和之辩 ·····	(135)
二、关于仁的讨论 ·····	(145)
三、张栻朱熹哲学的异同 ·····	(155)
第六章 张栻的教育思想 ·····	(160)
一、张栻的教育活动 ·····	(160)
二、政事以教学为先 ·····	(164)
三、教育目的与教育内容 ·····	(165)
四、教学方法 ·····	(169)
第七章 张栻学派的分疏 ·····	(175)
一、湖湘学派 ·····	(176)
二、传张栻学说的四川学派 ·····	(183)

第八章 张栻的地位和影响	(191)
一、张栻在宋代理学史上的地位	(191)
二、张栻的社会影响	(197)
后记	(205)

第一章 时代及背景

一、张栻生活的时代

张栻是宋代与朱熹齐名的著名理学家、哲学家和教育家。宋王朝建立于唐末农民大起义和五代十国的社会大动乱之后。唐末农民起义，扫荡了自魏晋以来世官世守的门阀士族，根本动摇了唐王朝的封建统治。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割据，造成了剧裂的社会动荡，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社会经济萎靡不振，人民生灵涂炭。宋太祖赵匡胤说：“自唐季以来数十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太祖建隆二年）自公元960年赵匡胤发动陈桥驿兵变，推翻后周，建立宋朝以来，宋代社会发生了与前代不同的变化。

（一）中央集权制统治的强化

宋太祖赵匡胤总结和吸取了唐末以来藩镇割据、拥兵持重的历史教训，以及自己篡权夺位的经验，认识到为了巩固

和加强宋王朝的统治，就必须加强专制君主的中央集权。制定出一套集中兵权、政权、财权、司法权的统治办法，利用“杯酒释兵权”，以高官厚禄为条件，削去了藩镇的兵权。为防止宰相专权，设置了参知政事和枢密使，以分散政权。又削弱了各级长官和地方的权力，逐步取消唐末五代时的“支郡”，各州直属京师。宋统治者为了控制财政，防止地方厚敛取利，削弱朝廷，派遣朝官驻各州监督税收，称“监当使臣”，又设转运使、转运判官，管理所属州郡的水陆转运和财政税收。宋太宗在各路设提点刑狱官职，各州涉及死刑的案件，必须上报朝廷，对地方的司法权作出限制。宋初统治者采取一系列的措施，把兵、政、财、法等权力全面集中到中央，基本消除了可能威胁君权和产生地方割据的因素。宋王朝从而全面地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权力，造成“政出于一”（《曲阜集》卷一，《上哲宗论君道在立己知人》），“权归于上”（《叶适集·水心别集》卷十，《始议二》）的局面，强化了中央集权制的封建统治。

（二）生产力的发展

宋朝建国以来，农业、手工业、商业等社会经济有了显著的发展。农业生产方面，耕地面积迅速扩大。宋初土地荒芜的现象很严重，据《文献通考》记载，宋太祖开宝九年（976）垦田数量只有二百九十五万三千三百多顷。到宋真宗天禧五年（1021）增至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多顷，四十五年间，可耕地增加近一倍。南宋时期，土质肥沃、灌溉便利的圩田更加发达，农田开垦面积逐步增加。宋代农业的发展，不仅表现为耕地面积的扩大，而且就深度而言，表现为耕作制度的改进、耕作技术的提高和单位面积产量的增加。宋代农业一年两熟制和两年三熟制面积日趋扩大，北方种植

水稻和南方种麦的土地面积，都在逐步增加。南宋初年，北方劳动人民大批南迁，和南方人民一起，进一步开发了江南的农田。北方农民带来了先进的耕作经验，使得农作物品种的种植得到增加。宋代兴修水利以及灌溉技术提高很快。宋高宗时，眉州农民修筑通济堰，使蜀州新津和眉州眉山、彭山等县三十四万多亩田得到灌溉。水车在宋代已普遍使用。优良品种的培育、耕作技术的提高以及兴修水利和农具改进的结果，促进了水稻单位面积产量的提高。宋高宗时，两浙路产量最高。明州亩产谷六、七石，是宋朝的最高纪录。

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手工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手工业中各个行业的规模扩大，分工细密，生产技术和产品数量、质量得到提高。北宋仁宗时，铁的年产量达到七百二十四万斤。一些地区出现了以从事纺织业为主的机户，梓州在仁宗时，已有几千家机户，这说明家庭手工业也日益得到发展。宋代的手工业技术也比前代有了提高。在冶炼行业，比较普遍地利用石炭（煤）作燃料，不仅加快了冶炼进程，而且提高了产品的质量。南宋时期的手工业，如兵器制造业、造船业、制瓷业等也有发展。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又促进了宋代商业的繁荣。商人的社会地位得到提高，商品经济在自然经济居支配地位的情况下，比前代有较多的发展。从事商业交流的城镇，规模扩大，数量增加。开封府在太宗时，有人口十八万户，是当时世界规模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商业的发展，使得朝廷的商税收入不断增加，成为国家财政的重要部分。宋太宗时，一年的商税总额达四百万贯，宋仁宗时增至二千二百万贯。临安府是全国商税最多的城市，在北宋熙宁十年（1077）是八万二千多贯，到南宋咸淳年间（1265—1274），增至四十二万贯。商税收入的增加，反映出宋代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商业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货币流通。北宋时期铜钱的